

书 名：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中华学术与中国文学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张岱年

本书作者：许 总

丛书策划：朱光甫

责任编辑：张国功 朱光甫

特约编辑：许志锐

封面设计：梅家强

版式设计：吴晓晓

出版发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 字数： 万

版 次：1999 年 月第 1 版第 次印刷 印数：

定 价： 元 ISBN7 - 80647 - 045 - X/I·39

邮政编码：330002 电 话：0791 - 8503450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一部研究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关系的专著。在中华学术史上,宋明理学无疑有着独特的地位。自南宋后期始,理学被奉为官方哲学,成为宋以后中国近古时期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作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结构与内涵的一大转折与新变,理学对总体社会思潮及具体意识形态的演进嬗变皆有重要的影响乃至支配作用。这种影响,在文学艺术领域表现得尤为复杂,各种文学艺术体类对理学或由感契而承受,或由撞击而交织,虽程度不同,方式各异,却皆显然由此而铸定其本质特性与形态风貌。本书以思想史的自身发展为经,以宋明时代社会心理为纬,分析理学的性质、演变,说明其历史必然性,探究其与文学艺术沟通联结的机制。在此基础上,着重通过对古文、诗、词、小说、戏曲等文学体类的性质内涵与表现形态发展演变轨迹的把握,考察理学在其中发挥的影响与作用。同时,通过对理学自身发展、演化、解体过程的描画,揭示出其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的折射及复杂表现。因此,本书既穷究了中国近古文学艺术史性态形成与演变的思想史根源,又将宋明理学的研究拓展到文学艺术领域,在对不同学科的整合中展示出文学史研究的新途径。本书运用大量的思想史与文学史原始资料,力求论题的深入,避免浮泛空疏,并进而形成宏观视野,使之上升到理论层面。

总序

张岱年

中华学术 ,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 ,诸子并起 ,百家争鸣 ,是为诸子时代。汉代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于是经学成为官学 ,是为经学时代。魏晋之世 ,玄谈盛行 ,以《老》、《庄》、《易》为三玄 ,是为玄学时代。之后 ,佛教逐渐发展起来 ,至隋唐之时 ,佛学有高度发展 ,而儒门淡泊 ,是为佛学时代。北宋时期 ,理学兴起 ,批判了佛学与道家 ,恢复了儒学的正统地位 ,理论思维有进一步的发展 ,经历元明 ,是为理学时代。到明清之际 ,许多学者批评理学的空疏 ,趋向于考证之学 ,是谓朴学时代。十九世纪后期以来 ,西力东侵 ,西学东渐 ,到二十世纪 ,出现了融会中西的学术思想 ,是为西学东渐的时代。

中华学术 ,根据传统的说法 ,分为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义理之学即是哲学 ,考据之学即是史学 ,词章之学即是文学。这是举其大要而言 ,还有经世之学即政治经济学说以及天文历算、兵法、地理、医药、农学等等。但是义理之学、考据之学与词章之学占主要地位。词章之学即文学 ,包含诗、赋、词、曲 ,与一般民众关系较为密切。各门学术是互相影响的。词章之学

亦受到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的影响。研究历代文学与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的关系 ,是有重要意义的。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中华学术与中国文学研究丛书》,主要研究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以及近代西学东渐对于各时代的文学思潮、文学风格和文学流派的形成发展等方面的影响 ,阐释各时代文学的特色及其发展过程 ,这是有重要意义的。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希望我为丛书写一总序 ,于是略述中华学术的源流作为弁言。

一九九七年八月 于北京大学

目 录

序论 近古文化史上的哲学与文学	(1)
-----------------------	-----

第一章 理学的特征与意义	(7)
第一节 理学的形成与发展	(8)
第二节 理学的性质与演变	(16)
第三节 理学的必然性及其历史地位	(29)

第二章 理学与文学的联结基础	(37)
第一节 宋代的崇文风气	(38)
第二节 宋人的心理结构	(45)
第三节 宋文化的理性精神	(55)
第四节 儒学的传统表现方式	(70)

第三章 理学与宋代古文	(77)
第一节 宋代古文复兴的儒学背景	(81)
第二节 理学家的古文创作	(96)
第三节 理学与唐宋古文统系的确立	(109)

第四章 理学演进与宋诗史程	(127)
---------------------	-------

第一节	理学先驱与宋调发轫	(128)
第二节	理学奠基与隆宋诗坛	(146)
第三节	理学集成与宋诗中兴	(163)
第四节	理学趋变与宋调式微	(190)

第五章 理学诗派

第一节	理学诗派概况及理学诗特点	(209)
第二节	邵雍 理学诗派之创始	(216)
第三节	周敦颐、程颢与张载： 学说自立与诗风同调	(221)
第四节	朱熹 理学宗师与诗坛大家	(228)

第六章 理学词派

第一节	理学家的词学观	(242)
第二节	理学词派及其创作特点	(250)
第三节	理学对词学的影响	(260)

第七章 理学与宋代文学观念

第一节	统合儒、道、释的文化观念	(273)
第二节	理学与禅悟	(287)
第三节	情理冲突的文学思想	(303)

第八章 理学分化与宋金元文学的变迁

第一节	传统与非传统意识	(316)
第二节	主情观念的高扬	(327)
第三节	理学弛张与文学盛衰	(334)

第九章	明代理学与反理学思潮对文学的影响	(347)
第一节	明初理学规范下的文风	(351)
第二节	王学分化与反理学思潮	(359)
第三节	从诗文复古运动到公安派、竟陵派	(366)
第四节	反理学思潮与小说、戏曲	(374)

第十章	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想与文学	(389)
第一节	宋明理学的总结与批判	(392)
第二节	文学观念的冲撞与涵融	(401)
第三节	文学创作的多样性繁荣	(414)

主要引用与参考书目	(427)
后 记	(431)

序论 近古文化史上的哲学与文学

在整个中国文化史的发展和演变进程中,宋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阶段。陈寅恪在半个世纪前已明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并指出其趋势乃在“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①。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小史》认为“从秦始皇到宋真宗,约计一千二百年(纪元前 220 - 纪元 1020),为中国的中古时代”,则明确以宋代为中国近古时代之开端。

宋代文化的核心是承续自唐代中期兴起的儒学复兴运动而最终建立起新儒学思想体系。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一向“汉宋”并称,一方面表明了宋代学术的繁荣程度,另一方面也标示了宋学对汉唐经学化儒学的反拨与革新。堺屋太一《知识价值革命》认为“十世纪到十一世纪后半叶北宋鼎盛时期是近代型高速增长与合理精神充溢的‘东洋文艺复兴’,甚至是超越它的‘亚近代’”,这一具有近世化色彩的文化精神,正是介乎中世纪精神与近代工业文明的中间形态。当然,精神文

^① 参阅《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化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 ,这一适应着近世化社会进程的儒学复兴究竟建立怎样的一种思想体系 ,则不能离开思想史渊源与社会史制约 ,这就是宋代理学最终成为宋学核心体现的原因。

总体看来 ,理学所努力建立的体系一方面是将社会需要的价值系统理论抽象为“天理” ,并规定为人性本身的内涵 ,另一方面则在排斥佛、道出世倾向的同时充分吸收佛、道思想菁华与思维方式 ,从而使儒学思辨化 ,使自身成为古典哲学的总结形态。在这样的“近世化”背景上重新审视宋明理学及其在文化领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当可得到新的理解和认识。

作为宋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文学不仅以其空前丰硕的内容展现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蔚然大观 ,而且以其独具的文化性格构成中国文学史的一大新变与转折。《宋史·文苑传序》云：

艺祖革命 ,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 ,宋之尚文 ,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在藩邸 ,已有好学之名 ,及其即位 ,弥文日增 ,自是厥后 ,子孙相承 ,上之为人君者 ,无不典学 ,下之为人臣者 ,自宰相以至令录 ,无不擢科 ,海内文士 ,彬彬辈出焉。国初杨亿、刘筠 ,犹袭唐人声律之体 ,柳开、穆修 ,志欲变古 ,而力弗逮。庐陵欧阳修出 ,以古文倡 ,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 ,宋文日趋于古矣。南渡文气不及东都 ,岂不足以观世变欤？

它在描画宋代文学极盛局面的同时 ,着重说明了其“变古”的根本特征以及与“世变”的深刻关联。

具体地看 ,宋代文学中最直接最集中体现宋代文化特质的

领域是古文,宋代古文运动的先驱柳开在《应责》中就已明确宣称:

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

文学复古与儒学复兴两途同源,极为明晰。当然,宋代古文运动源自唐代中期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唐代古文运动,并由此构成一个完整的文学复古思潮。但是,与唐代儒学统系崩坏于晚唐一样,自晚唐经五代直至宋初,古文衰落,文风绮艳轻靡,唐宋古文运动实际上出现了一个长达两百年的巨大断裂,而宋代古文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唐代古文运动的承传接续,显然也就带有了新的内涵与性质。如柳开早年学习韩、柳,但他为古文的真正目的是“为立身行道,必大出于人上”(《再与韩洎书》),认为要成为“宋之夫子”,必须进而“备六经之阙,辞训典正,与孔子之言合而为一”(《补亡先生传》),因此舍韩文而直接以六经为法。《东郊野夫传》就称他“所著文章与韩渐异,取六经为式”。这种重道轻文的态度,实际上正体现了宋代理学的一个基本观念,正是因此,柳开被后来的理学家奉为复古明道的先驱人物。宋代古文运动确立于欧阳修。在宋代政治文化一体化进程中,欧阳修主张将复兴古道与政治改革实践结合起来,通过政治革新完成文风的变革,并对韩愈的明道观念进行修正,赋予行道者以天下为忧的责任感,以之作为复古的根本目的。在文学传统渊源上,欧阳修比其前辈观念更为通达,为文诸体皆工,富于新创,改变了一味因循韩、柳之旧习,促使北宋古文六大家相继而起极盛局面形成,为整个宋文学史新变特质构定了基调。

在宋代文学史上最具新变性质的领域是诗歌,而独具风貌的

宋诗的建立,却恰恰也是由宋代儒学复兴运动所催生。本来,中国古代文人诗至唐代已达高峰,而宋诗在唐诗集大成之后又开辟出古典诗史的新纪元,无疑体现了尤为强烈的创新精神。从社会价值体系看,宋诗固以议论化特征表达对政治社会问题的看法和见解,但从思想文化精神看,宋诗更重要的特征显然在于随着哲学思辨能力的增强而形成的哲理化,宋代诗人往往集学者、诗人于一身,本身就是对其哲学造诣与人文修养的说明。正因置身浓厚的人文文化氛围,宋诗中宏肆议论与深邃理趣大多发自生活情怀,从而表现出人文化、世俗化与理性化的根本的文化性格。如果说,唐诗主要是通过自然意象表现积极进取、高昂向上的时代精神与思想风貌,那么,宋诗就主要是通过人文意象表现对现实的关注与人生的思考,这种人文情怀恰恰可以视为被“近世化”文化进程所涵孕。因此,在具有“近世化”色彩的宋代文化史上,宋诗与理学恰呈一种互释关系,两者在各自的演进过程中形成互相渗透、互为影响的势态也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了。从哲学与诗学的关系看,中国古代哲理诗源远流长,诗中蕴含哲理几乎与诗的产生同步,古代哲人亦往往借助诗的形式阐释哲理,所谓“诗化的哲学”可以说是中国诗学与中国哲学的共同品格。但就狭义哲理诗而言,则自东晋玄言诗开始,继之以隋唐道释诗,终之以两宋理学诗,于是玄言诗、道释诗、理学诗便构成中国文学史上三大哲理诗形态。由此可见,与理学作为中国古典哲学的总结形态一样,理学诗也正是中国古典哲理诗的终结形态。理学诗作为哲学与诗学关系的高度凝聚,自然也是理学与宋诗关系的集中体现,因而“宋人诗主理”便成为宋诗的最突出特征和标志。这一标志一经形成,便成为与唐诗并峙的又一诗学范型,而由这两种诗学范型互相冲突而造成的诗学变迁乃至唐宋诗之争也就既构成后世诗学的重要内容,又折射着理学在宋以后的盛衰起伏乃至学术思

想演化的精神历程。

此外,宋代新文体呈现空前繁荣局面。词继晚唐五代之后得到大规模发展,成为宋代标志性文学形式;话本与戏曲在宋代更是民间广泛流行的艺术形式,成为元、明、清时期戏剧、小说发展的基础和典范。这类通俗文学的兴盛,究其原因,显然与当时都市经济的繁荣密切相关,正是“近世化”社会文化的直接产物。从表面上看,通俗文艺与作为宋学核心体现的理学关系较远,甚至处于相互排斥的地位,但实际上,以理学为标志的宋代儒学复兴,本身就是对传统儒学的革新,以一种新的儒学体系构成对汉唐经学体系的反拨,其实质是以儒家道统之名行革新创变之实。因此,作为“近世化”时代的哲学,不仅对正统文学体式如古文、诗歌的性质和内涵构成直接的规范,而且对新出现的作为“近世化”社会文化直接标志的通俗文艺形式亦有深层的作用与影响。如词在宋代逐渐文人化,并出现“以文为词”、“以诗为词”的现象,就突出地表明了这一点。甚至在批评标准上两者亦由对立逐渐走向结合,如赵彦卫《云麓漫钞》就认为唐人传奇“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曾慥则编纂小说总集《类说》,并在序言中说“小道可观,圣人之训也”,认为“可以资治体,助名教”,显然已将通俗文艺与传道精神融为一体。

理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有着自身的庞大的思想体系和漫长的发展过程。就其构成因素而言,作为古典哲学的总结形态,它既是传统儒学的集大成与新发展,又兼融了释、道哲学的思想理论与思维方式。就其发展过程而言,它的最初源头在于唐代中期的儒学复兴,确立于北宋中后期,极盛并分化于南宋后期至明代前期,进一步分化并衰落于明代中后期,总结于明清之际。正是由于这样复杂的构成因素与漫长

的演变历程 ,理学对各种体式、各个阶段的文学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的程度和方式。

总体而言 ,理学注重的是性理之学 ,文学则注重情文之美。但是 ,在宋代开端的文化“近世化”进程中 ,理学与文学形成了交流与沟通 ,理学家藉文以传道明心 ,文学家重理而文以致用 ,而文人往往集学者、文士于一身的现象 ,更直接推进了文学与理学的融构进程。

当然 ,具体地看 ,理学与文学除南宋理学极盛时期外 ,并不是一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它内部的分化也一定程度地削弱了对文学的影响 ,明代中后期甚至出现大规模的反理学思潮 ,但是 ,各种文学艺术体类对理学或由感契而承受 ,或由击撞而交织 ,虽程度不同 ,方式各异 ,却皆显然由此而铸定其本质特性与形态风貌 ,宋代以后的整个文学艺术史实在与理学有着解不脱的干系。因此 ,从理学与文学关系的角度 ,特别是对两者既矛盾又交织的复杂的演进历程加以深入考察 ,无论是对宋以后的思想史还是文学史的研究而言 ,都是一个极有意义和价值的课题 ,从中我们不仅可以发现近古文学演变过程中的时代新质与迷人风采 ,而且可以进一步领略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庞大、复杂与深邃。

第一章 理学的特征与意义

宋明理学,是一个特定的思想史概念。狭义地说,它特指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及明代王守仁等人致力于探讨性、理、道、器等问题的哲学思想,而广义地说,“理学不是一个学派,也不是一家完整的哲学学说,它是我国特定时期(公元十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的哲学史断代的统称”^①。自南宋后期始,理学进而被统治者奉为官方哲学,对中国近古时代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思想领域都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理学历时长远,主要的理学家集中于宋、明两代,但实际上就其思想渊源而言,理学实肇端于唐代中期的儒学复兴运动,就其理论性质而言,理学在明代后仍沿承不绝,直至清代中叶。理学内涵复杂,既形成以程、朱为代表的主流派,又同时存在许多非主流派,乃至由各派的分化而出现更多的旁支别派。在这样的意义上看,理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实际上独占着

^①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第158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近千年的整个封建社会后期 ,而由其理论的特点和性质 ,又完全可见一种自成体系的哲学形态与独具特色的思维方式。通过对其形成与发展轨迹的描画 ,对其内在性质与演变的把握 ,则可以进而发现宋明理学历史地位确立的必然性以及其重要的文化史意义。

第一节 理学的形成与发展

理学又称道学 ,且道学之名为早。但细察之 ,两者却明显有区别。北宋时二程的学说即称道学 ,至南宋时 ,道学分化 ,道学之名只适用于程、朱一系的学说。因此 ,总括地看 ,道学较理学的范围小得多 ,具有特指性 ,亦即作为对理学中正统主流派——程朱理学的特指。而理学则不仅以程朱理学为主干 ,而且包括了理学分化后的诸多学派。在明代时 ,道学之名更逐渐被理学所取代。

道学之称 ,最早见于张载《答范巽之书》中 ,其云 :

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 ,此正自古之可忧者。

稍后程颐《又上太皇太后书》亦云 :

陛下圣虑高明 ,不喜浅近 ,亦将勉思义理 ,不敢任其卑俗之见 ,惧获鄙于圣鉴矣 ,诚如是 ,则将见道学日明 ,至言日进 ,弊风日革 ,为益孰大于此 ? 臣职当辨明 ,义不敢默。

这里的“道学”之义似尚属泛指 ,但道、学二字已联缀成词 ,作为一个固定的名称 ,便由此逐渐定位于规范的含义。如程颐在《祭

李端伯文》中说：

自予兄弟倡明道学 ,世方惊疑。

在《明道先生门人朋友叙述序》中又说：

先兄明道之葬 ,顾状其行 ,以求志铭 ,且备异日史氏采录 ,既而门人朋友为文 ,以叙其事迹 ,述其道学者甚众。

在这里“道学”专指二程及其门人的学说 ,且已初具“传圣人之道”的意思。

南宋淳熙年间 ,由于朱熹等人的大力提倡 ,程氏之学大行于世 ,道学遂盛极一时。朱熹不仅反复强调“道学”的重要性(如在《论语集注》中释《管仲之器》时说：“道学不明 ,而王霸之略 ,混为一途” ;在《答张钦夫》中又说：“道学不明 ,无一事是 ,当更无开眼处”) ,而且明确了“道学”的范围。其于《中庸章句序》中云“子思忧道学之失传而作也” ,于《程氏遗书后序》中又云“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学于孔孟既没千载不传之后 ,可谓盛矣” ,可见“道学”就是指继承了孔孟道统真传、以二程“洛学”为主干的学术思想体系。由于二程师从周敦颐 ,又与张载关系密切 ,所以朱熹所说的道学范围包括周、张、二程之学。其后朱熹编《伊洛渊源录》 ,列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杨时、胡安国等 ,就是意在以伊洛一系为“道学”划定范围。由此可见 ,在朱熹看来 ,宋学中除伊洛一派的其他学派 ,如北宋时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温公学派”、以三苏为代表的“蜀学”乃至南宋时以陈亮为代表的“功利之学”、以陆九渊兄弟为代表的“心学”、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 ,统统被排斥于“道学”之外。朱熹在《与刘

子澄》中曾明言：

近年道学 ,外面被俗人攻击 ,里面被吾党作坏。婺州自伯恭死后 ,百怪都出。至如子约 ,别说一般差异底话 ,全然不是孔孟规模 ,却做管、商见识 ,令人骇叹。然亦是伯恭自有些拖泥带水 ,致得如此 ,又令人追恨也。子静一味是禅 ,却无许多功利术数 ,目下收敛得学者身心不为无力 ,然其下稍无所依据 ,恐亦未免害事也。

认为婺州学者“不是孔孟规模” ,陆氏之学则“一味是禅” 。这样就使得“道学”的范围愈趋狭隘。

实际上 ,当时的一些学者即自认不属于“道学” 。如陈亮自云：亮虽不肖 ,然口说得 ,手去得 ,本非闭眉合眼 ,朦瞳精神以自附于道学者也。(《又甲辰秋书》)陆九渊固然“自谓孟子之后 ,至是而一始明也”(《与路彦彬》) ,以承传孔孟道统为己任 ,但却认为：“道本日用常行 ,近日学者却把作一事 ,张大虚声 ,名过于实 ,起人不平之心 ,是以为道学之说者 ,必为人深排力诋”(《语录下》) ,极力指斥道学。南宋时甚至出现过数度反道学思潮 ,先是郑丙上疏：“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 ,欺世盗名 ,不宜信用”(《道学崇黜》) ;后又有林栗上疏攻击朱熹：“本无学术 ,徒窃张载、程颐之绪余 ,谓之道学 ,私自推尊。”(《朱子年谱》引)正是因此 ,元人修《宋史》时特立《道学传》 ,专列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及其门人弟子 ,与朱熹《伊洛渊源录》基本一致 ,而陆九渊、吕祖谦、陈亮等人则被列入《儒林传》。对此 ,清人黄宗羲指出：“十七史以来 ,止有《儒林》 ,至《宋史》别立《道学》一门 ,在《儒林》之前 ,以处周、程、张、邵、朱、张及程朱门人数人 ,以示隆也。”(《宋元学案》卷二)可见 ,在“道学”的名目下 ,程朱之学与